

胡適的訪港之旅與在地迴響（1935年）*

陳學然**、吳家豪***

摘要

本文有以下五個重點：第一，釐清胡適如何因為英國退還庚子賠款而與香港結緣的經過；第二，胡適怎樣幫助香港大學推動中文學科課程改革、系主任人事招聘等事宜；第三，胡適接受港府與港大校方的邀請來港，接受了人生首個名譽博士頭銜，本文將展示他在港五天的行程安排與人事交際網絡；第四，胡適旋風式訪港後，在廣州與香港本地都引起截然不同的社會迴響，本文將闡明胡適訪港的在地熱烈迴響情況，並彰示遲來的香港文言、白話之爭；第五，綜合胡適在港的演講與文化交流，觀察香港的華人領袖與前線教育官員如何評價胡適倡言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藉由上述研究，將可啟發我們進一步從他者視角或中國境外的異域位置重探胡適其人其學的時代意義。同時，我們也可以從相關研究中，看到中國政局發展對香港經學教育、中文課程改革乃至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實質性影響。

關鍵詞：胡適、香港、港大中文改革、在地因緣、白話文、經學教育

*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項目「白話文在香港的初期發展史（1920-1935）」（CityU 11606123）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畫——「嶺南文化與世界：廣東文人文化景觀的建構及轉變（1821-1949）」（C4006-22GF）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以〈胡適的香港因緣〉為題，發表於由林毓凱教授主辦的「紀念胡適先生誕辰 130 週年及逝世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香港城市大學主辦，2022 年 5 月 8 日），評議人何杏楓教授給予十分寶貴的修改意見；本文同時獲得學報兩位匿名評審人細緻而中肯的審查意見，因此而有機會以更成熟的面貌與讀者見面。作者謹致謝忱。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講師。

一、前言

自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等人於 1915 年發起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中國以經史為主的舊式教學，日遭揚棄。但是，香港以經史為主的中文教學模式，則一直維持至 1930 年代中期仍未見有太大的變化。胡適於 1935 年 1 月訪港，短留五天，發表數場演講，還與香港政界、商界及教育界領袖討論中文教育改革的方案，闡述其文藝復興的理想，宣揚白話文的發展方向。香港大學在胡適訪港的六個月後，在胡適的穿針引線下成功聘請許地山（1893-1941）執掌港大中文系，將港大的中文教育改革成與中國課程相若的現代模式。

胡適訪港，可以說是為香港學術發展史、教育史留下一段佳話，也為中國與香港的文化交流結下奇妙因緣。不過，對於胡適為何訪港、如何訪港，結果如何，帶來了怎樣的貢獻等等，目前的論述有不少都只是輾轉相引，語焉不詳。本文的撰述，現階段將集中於胡適為何訪港及如何安排訪港行程為中心，由是探究他的在港活動所反映的人際交流網絡與在地社群互動，進而展開他與香港結緣的來龍去脈的討論。

根據目前研究所見，從胡適參與英國庚子賠款（中英庚款）退還中國事務，再到協助港大中文系發展的工作，相關研究成果不多。不少胡適研究領域裏的學術著作，均未太關注胡適與英庚款及港大的因緣問題，¹ 因此難免忽略一些胡適在中國境外活動的人事網絡的構成

¹ 相關研究，如果獨立地將兩者分開言之，則學界的研究成果還是不少的。譬如江勇振的《日正當中 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對於胡適訪英一事便有所著墨，還特別關注了獲委任為中英庚款委員的胡適在訪英前的思想活動狀況。胡適出發前曾豪言自己已經能夠與昔日高不可攀的英國人物相交，這實際上突顯了出任官方代表的身份為胡適帶來了一定的自豪感及新的自我期許，這對研究胡適在參與庚款歸還中國的諸多活動裏的各種目的與規劃，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見江勇振，《日正當中 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年），頁 930；關於胡適與港大中文教育發展的關係，可

以及具體交遊活動的展開問題。² 這讓我們對於胡適的學思活動及其在地社會的影響力的研究，仍然感到有不少值得繼續發掘的地方——尤其是胡適與香港的結緣過程反映的時代意義，以及由此反映的變動時局中，中國與香港在方方面面高度互動的歷史底蘊。

基本上，有關胡適於香港的在地活動、歷史底蘊與時代意義，至今仍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與不少言過其實的南來文人「貢獻論」、「影響論」恰好相反的是，胡適訪港的經過與意義被忽視及低估。本文將讓讀者重新看見，胡適於1935年是如何儼如政治要人般接受「官式」的訪港禮遇，他與香港本地社會各階層均有廣泛的交流、互動，並且引起不同階層的實質或「實績」迴響。最值得留意的是，胡適與港府及港大管理層、港府教育官員與前線教師、佔政商要津的華人領

參考趙靖怡、席雲舒，〈胡適、陳受頤往來書信考釋〉，《魯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4期（2021年4月），頁66-85。透過胡適與陳受頤（1899-1977）的通信，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討論港大中文學院的改革問題及系主任人事聘用問題，強調了二氏在當中發揮了重要的牽線作用，其中也點出了港大曾一度屬意陳受頤來港任職的意願，不過，該文的焦點並不在胡適與港大的結緣經過或來港後的活動足跡。學界關於胡適與港大中文學院的研究成果，還可見於以下論著：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文學》第80期（1991年8月），頁60-64；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3卷第5期（2009年9月），頁26-30；耿雲志，〈胡適在香港講演引起的風波〉，《百年潮》1997年第5期（1997年5月），頁78-80。

² 誠如歐陽哲生所說，目前對胡適與地域關係的研究，只有胡適的出身地安徽較多人關注，其他與胡適有密切關係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學界都「不太在意胡適與它們的關係」。見歐陽哲生，《胡適的北京情緣：一個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21年），頁2。既如是，則香港這個位處中國南端的文化邊緣小島，雖曾得胡適的短暫訪問，如不加以整理，箇中的歷史故事與文化發展脈絡便可能語焉不詳，甚至可能會湮滅無聞。本文的相關研究，則將會透過研讀英國殖民地檔案（Colonial Office, 卷號 CO 129, CO 323）、英國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卷號 FO 371）及香港大學檔案館檔案（HKU Archives）、金文泰檔案（Papers of Cecil Clementi）、香港大學創辦人盧吉（1858-1945）的私人檔案（Papers of Fredrick Lugard）、香港早期報章、陳君葆（1898-1982）的《陳君葆日記》（陳氏為港大文學院首屆畢業生，胡適訪港時出任文學院翻譯，歷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館長），由此勾勒出胡適與香港的在地因緣。

袖都有深刻互動，這是拆除香港舊學樊籬的重要一步，同時也為香港耕耘已久的本土新文化群體拓展出更大的文化發展空間。胡適對香港的文學「實績」與在地「貢獻」，恐非數年後（1938年抗戰以來）來往中港如「候鳥」的南來文人可一一比擬。³

二、因庚款而與香港結下淵源：胡適與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的發展

胡適與港大的淵源，可以從中英庚子賠款說起。1925年，英國國會通過了中國賠款（運用）法案（China Indemnity (Application) Act.），決定將一千一百多萬英鎊庚款「運用」於中國作教育事務的發展經費。中英雙方協議成立由六名英人，三名華人組成的「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China Indemnity Advisory Committee）審議庚款的用途。胡適獲委任為委員之一，箇中理由，相信與胡適的才能、社會知名度以及對英態度有關。胡適自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遠至英國亦有所聞，使其在英國外交部候選人名單中被冠以「中國文藝復興主要推手」（Chief promoter of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年青中國」的

³ 香港學者如王宏志、陳國球、樊善標等，曾經檢討及論述1940年代以來南來香港的「群體」或「媒體」的在地影響力與貢獻。他們的研究指出了不少南來文人帶上有色眼鏡看待香港的種種人事物，南來者對香港本土的前世今生或社會事物了解興趣其實不大，故此他們對香港很難說得上有什麼樣的「實績性行為」與「啟蒙」意味。詳參樊善標，〈從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1941）編輯策略的本地面向檢討南來文人在香港的「實績」說〉，《台灣文學研究》第6期（2014年6月），頁308-309。另外，有關檢討、質疑南來文人的影響論的研究，可見王宏志，〈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31-32；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著，王德威主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54-55；陳國球，〈中國文學史視野中的香港文學——「香港」如何「中國」〉，《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49-59。

領軍人物等（a leading light in “Young China”）稱譽。⁴ 1926年8月，他親赴英國出席庚款審議會議。胡適在英期間獲邀在多個城市巡迴演講。除了於主要城市倫敦、曼徹斯特城、伯明翰等地的大學外，也曾到學術重鎮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演講。每次演講都有大批社會名流出席聆聽，受到十分熱情的招待。

胡適所參與的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所審議的，涉及英庚款歸還中國時的使用條款、撥核程序與用途審訂問題。他要處理的其中一道問題，便是應否為當時被英人視為中國境外、正深陷財困的香港大學提供庚款資助。港大校方當時以發展港大中文教育為由，申請庚款撥備。⁵ 從英國檔案所載的中英庚款會議記錄所見，胡適當時是表態支持香港大學成為庚款的受惠對象。相關的紀錄撮錄如下：

主席及兩名英籍委員在審視過香港大學的需求後，經過考慮，均滿意香港大學提交的計劃。香港大學為來自中國各地及其他地區的華人提供優良的教育。因應港大的中文教育備受忽視，他們強烈支持港大發展中文系……胡適表態認可支持香港大學發展中文系的計劃。此外，胡適建議香港大學增加華人教職員的數目。⁶

胡適不但公開表態認同香港大學應該獲得庚款補助，從而加強

⁴ S. P. Waterlow, “Telegram from S. P. Waterlow to Lord Eagle Buxton,” April 26, 1925,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 FO 371/10927/F1303, pp.160, 167-171.

⁵ 有關港大怎樣以中文學院發展為由申請中英庚款補助的來龍去脈，請參考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1998年12月），頁60-73。

⁶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Report by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to the Advisory Committee appointed under the China Indemnity (Application) Act, 1925,” June 18, 1926,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 2(1926), pp.133-134. 此處由作者依英文原文翻譯。

居港華人的中文教育發展。他還提名港大校長康寧（William Woodward Hornell, 1878-1950）出任日後負責審批庚款的「庚款董事會」委員。⁷ 由此可見，胡適很早已經知悉港大校方要創立中文系、改進香港中文教育的計劃。不過，胡適可能沒有想到的是，港大的中文教育在 1935 年之前因為社會保守氛圍及欠缺適合的教授人選，一直所走的卻是與中國主流語文教育迥異的傳統經史舊路。就如胡適在 1935 年訪問香港後對香港教育的評語：

這裡的文科比較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⁸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與中國內地南轅北轍，是有其獨特的社會因素的。當胡適等庚款委員支持港大利用庚款發展中文教育後不久，便碰

⁷ 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為調查中英庚款的運用方針，派出以威靈頓（Viscount Willingdon, 1866-1941）為首「威靈頓訪問團」到訪中國不同城市考察，以訂出庚款應用及管理方針。訪問團成員包括威靈頓、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及安德臣夫人（Dame Adelaida Anderson, 1863-1936），以及三名華人委員胡適、丁文江（1887-1936）、王景春（1882-1956）。見 Frank Ashton-Gwatkin, “Frank Ashton-Gwatkin to Viscount Willingdon,” January 11, 1926,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11637/F1174, pp. 31-32. 「威靈頓訪問團」完成中國的考察後，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參考訪問團的考察成果，於 1926 年 10 月發布報告書，建議成立一個「董事會」負責審批中英庚款。在討論日後管理庚款的董事局人選時，胡適於 1926 年 8 月 20 日之前便曾推薦港大校長康寧出任董事。見 Victor Wellesley, “Victor Wellesley to Ronald Macleay,” August 19, 1926,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11640/F3173, pp. 122-125.

⁸ 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年），卷 5，頁 61。

上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掀動北伐戰爭。當北伐軍收回九江、漢口租界時，英國派出軍艦遠征上海示威。中英之間上演連串政治對峙事件，兩國關係突然間變得十分緊張，中英庚款的審議工作遂告停頓。⁹ 不過，香港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7）眼見所要爭奪的庚款仍未到手，為保持港大的競爭力以及進一步加強爭逐的說服力，他希望負責審議庚款的委員會能夠了解到港大有真正的決心改進中文教育以增加香港華人對英國的好感，藉以穩定華人的民心民意。同時，金文泰也了解到發展中文教育乃是出自廣大華人社群的本身意願。¹⁰ 於是，在前清翰林賴際熙（1865-1937）與港大校長同赴南洋籌得四萬港元作為經費後，港大便成立了一個小型的學術單位華文部（Chinese Session）。當四萬元經費耗盡，港大在港督金文泰的推動下，向華商再籌得二十萬港元創立一個規模較小於「學系」的「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金文泰希望，港大能夠預先做出一些成績，讓英國方面看見在港官員及華人紳商是如何共同為了英國在華利益而努力，又是如何推動在地文化合作而奮鬥，希望藉此而贏取庚款委員會的好感。¹¹

⁹ 中英庚款退還方案因時局丕變，胡適等幾位委員在完成中國庚款考察而寫成的報告最終未有實行。1931年的最終定案是經由中國外交部與英國協商而成的。參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頁459-460。

¹⁰ 在金文泰上任以後，多名熱心中文教育的紳商上書促請港府加強中文教育。他們的請求得到接納，港府於1926年創立了首所由政府公帑營運的官立漢文中學（後為紀念金文泰而易名為金文泰中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後，其學生主要來自官立漢文中學的畢業生。參〈香港漢文中學定夏曆來春開辦〉，《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6年1月21日。

¹¹ 「中文學院」經費由華商捐助，但只是一次性，只能勉強運作數年，其目的是希望作為一個展示的案例，讓庚款委員會了解港大的決心及用意。中文學院規模小於「學系」，其學生並非經香港大學入學試入學，他們的英文水平不高，因此不能頒授學位，只能頒授特別文憑。金文泰的構想是，待如願獲得庚子賠款的撥款後才再將之擴大至頒授學位的獨立學術部門——一所規模宏大的“Faculty”，而不是不能頒授學位的“School”。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at Government House at 11 a.m. on Friday,” February 17, 1928,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香港的華人紳商多有尊孔心態，十分著重傳統經史教育。¹² 另一方面，居港的知識群體主要由前清粵籍翰林如賴際熙、區大典（1868-1937）及其弟子們如香港首所官立中文中學「官立漢文中學」校長李景康（1890-1960）所組成。在這情況下，依重前清翰林籌組起來的中文學院，所走的是與中國內地不同的傳統經史路線。作為一校之長的康寧，他本人並不認同有關方向；他認為港大中文的發展應該走現代模式，眼前的系主任賴際熙絕非帶領中文學院的合適人選。康寧最屬意的人選，就是猶如胡適這種兼通中西學問的現代學者。¹³ 不過，金文泰是個十分強勢的洋總督，對自己的中文造詣、與教育理念充滿自信。他是英國牛津大學高材生、精於廣東話及國語，也是個學者，出版了多部學術著作，曾將嘉慶時期的廣東詩人招子庸（1786-1847）的《粵謳》翻譯成英文。金文泰的學術背景，令他在忙於香港管治事務外，亦熱衷於參與港大事務。金文泰認為，在香港只有強調「傳統經史」才能得到華人領袖的尊重以及華人社群的支持。¹⁴ 在他的執政下，傳統經史之學成為中文教育的核心課綱。

港大校長康寧面對一個對教育有如此強烈看法的殖民地總督兼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Chinese Studies Box 2, p.3. 1932年，港大進行改革，中文學院被解散併歸文學院內。為免混淆，在本文論述中的中文教育學術單位以1932年為界線，1932年前的以「中文學院」稱呼，1932年後的則稱作「中文系」。

¹² 香港社會獨特之處，在於香港華人需要面對一個英語的殖民管治政府，港府一直推行重英輕中的教育政策，令社會出現以英語為尚的風氣。中國傳統文化反過來在一些華人領袖或紳商眼中，成為了一種「抵禦外族文化壓迫的最後堡壘」。參陳國球，〈總序〉，收入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25。

¹³ W. W. Hornell, "Note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February 8, 1928, The National Archives,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24/2, pp. 73-80.

¹⁴ Fredrick Lugard, "Notes of Conversation with Clementi," February 20, 1931,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Fredrick Lugard, MSS Lugard L95/5, pp.1-2.

大學監督，只能言聽計從。1930年，金文泰被調離香港，轉赴新加坡及馬來亞任職。港大此時也如願從中英庚款中分得 265,000 英鎊的補助，能夠有充裕資金聘請學貫中西的優秀學者來校改革中文教育、發展新課程。康寧首先面對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課程及人事編制上的問題。一直以來，中文學院表面上是港大的學術單位，但由於是華商捐資營運的，因此是獨立於港大常規編制以外。大學的董事會中，亦有為數不少的華人領袖出任；康寧即使是校長，也未能以一己之見對港大的中文課程改弦易轍。他如要對之進行改革，則要獲得港督的同意方能進行。據此，當新任港督貝璐（William Peel, 1875-1945）履新後，康寧便上呈一份長達十六頁的改革建議書，力陳改革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的重要性。當中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其時經史之學與中國主流學制脫軌，他更明言謂：「香港大學的創立是為了迎合中國的需要」。¹⁵ 由於港大入學試與香港的中學教育掛勾，所有投考香港大學的考生都必需應考經史為題的中文試題。當 1930 年內地的課程大多已經捨棄經史教育而轉用白話文學習中國語文的時候，如果港大入學試仍墨守成規地以經史為考核內容，這等同於直接地將中國學生排拒於港大之外。¹⁶

繼金文泰出任港督的貝璐，他並沒有金文泰般的深厚學術背景。他的教育政策理念是首重實際應用，最為他關心的地方恰與康寧相同，就是目下港大的教育是否合適香港與中國的社會所用，它能否與中國接軌而讓學生學以致用。¹⁷ 貝璐認為經學在中國國內教育既然已被廢止，香港縱然可予保留，但也不能夠繼續將之視作中文教育的主

¹⁵ W. W. Hornell, "Minute by the Vice Chancell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ctober 9,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p.8.

¹⁶ W. W. Hornell, "Minute by the Vice Chancell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ctober 9,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p.8.

¹⁷ William Peel, "Despatch from William Peel to Lord Passfield," October 16,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pp.1-3.

體課程。¹⁸ 在得到港督的認可及來自庚款의財政支持後，康寧隨即啟動改革計劃。

港大中文學院本身存在極大局限，它難以吸引學生入讀。康寧曾經坦言中文學院畢業生難覓出路，就連香港政府的教育司署都不會聘請該院畢業生出任中文教席。¹⁹ 加上主管中文學院的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等人都不懂英文，校方根本無法與他們溝通，更加不了解該學院的實際運作情形，彼此間存在著基本的溝通隔閡。更甚者，前清翰林們所編排的傳統經史課綱，早已不為香港學生接納。

影響香港的文化發展，有內在因素，亦有外在因素。國際政局發展及國內社會變化，致使香港的政經變局直接影響其內部社會的文化轉型。從不少資料可看到，1930 年代初的香港，在中港關係上愈趨密切。向來被視為文化孤島的香港，此時也被國民政府要求與中國教育體制接軌。當香港的中小學教育無不跟隨中國國內教育體制發展後，港大也難以再獨善其身、緊抱古文教育不放。

1931 年，廣東教育廳要求香港私立學校依照《私立學校規程》於廣東教育廳立案。²⁰ 換言之，僑校採取內地的「六三三」模式，即六年小學，三年初小，三年高小，而不是香港主流英文學校所採用的學制。廣東當局的做法，是因為陸續有廣東學校「因應時勢的轉變和國民政府的鼓勵措施」來港辦學興教，而它們的畢業生又往往會選擇回

¹⁸ 貝璐批評大學入學試包含以經史為題的必答題是香港教育的一個「內在弱點」，讓年青學子修讀經史是浪費光陰。William Peel, "Despatch from William Peel to Lord Passfield," October 16,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pp.1-3.

¹⁹ W. W. Hornell, "Letter from W. W. Hornell to Arthur Mayhew," February 21,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pp.51-54.

²⁰ 方駿、熊賢君，《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公司，2008 年），頁 182-183。

粵甚至是赴奔京滬升學。²¹ 這些南來辦學的僑校，除了要受殖民地政府的監管，也要向國民政府立案。此情此境下，香港的中學中文教育自然會向中國內地靠攏，康寧針對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順應中國的需要。²²

由於改革港大中文教育，必需同時改革中學的教育，牽一髮而動全身。康寧希望革除舊式中文教育而發展貼近中國目前主流的文教方針，培養出適用於今天中國社會的人材。他改革中文課程的第一步，便是將賴際熙主持的中文學院解散，其次是將課程重組後劃歸文學院管理，併歸為中文系；第三步是邊緣化賴際熙。康寧的三招看來是奏效的，至使賴氏向前任港督金文泰抱怨自己在港大如何被架空的經過、如何被完全邊緣化的苦況。²³

不過，康寧其實並沒徹底廢棄經史的意圖，²⁴ 他規定新聘請的系主任，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要把重新修訂的經史之學編進文學院課程，但經史不能再是課程的主軸。²⁵ 為聘得合適的新系主任，康寧用盡人脈廣招賢能。他也透過認識的歐籍漢學家協助尋找人才，同時又在中

²¹ 如1930年代來港辦學的陸校較著名的便有1933年遷至的培正書院，以及1935年的真光書院。梁操雅、丁新豹等著，《教育與承傳：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年），頁20-21。

²² W. W. Hornell, "Minute by the Vice Chancell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ctober 9,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p.8.

²³ 賴際熙致金文泰，寄出日期不詳，金文泰於1933年1月10日收到此信。Lai Chai-Hei, "Letter from Mr. Lai Chai Hei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ment," January, 1930,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32/File 1, pp. 39-45.

²⁴ 根據1936-37年度的課程介紹，「中文系」分拆「中文」、「歷史」及「哲學」三系，仍有保留傳統中文的科目，包括「詩賦駢文」、「唐宋元文」、「先秦諸子研究」、「中古史」、「宋明思想」等科目。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36-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36), pp.142-147.

²⁵ W. W. Hornell, "Letter from W.W. Hornell to Arthur Mayhew," February 21, 1929,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pp. 51-54.

國刊登報紙招聘。²⁶ 他在曾擔任溥儀（1906-1967）皇帝英文教師、前威海衛總督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的幫忙下，輾轉獲得林仰山（Frederick Segquier Drake, 1892-1974）首肯出任系主任一職。但是，當林仰山與港大談妥各種聘用條件後，後來卻因原本任職機構的人事調動而未能赴港上任。²⁷ 康寧為此白忙一場而大感失望，不得不重新啟動招聘工作。1933年11月，康寧獲得胡適答允協助，隨後更親身前往北京會見胡適，商討招攬人材的各種準備工作。²⁸

1933年12月12日，胡適致函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陳受頤，講述港大希望在內地聘請中文系主任一職之事，提及他當晚會見了港大校長康寧，並與熟知粵港社會事務的陳受頤約定時間一起會見康寧。在胡適的引薦下，陳受頤與康寧見面，協助尋覓適合人選。胡適在給陳受頤的信函中，還提及廣東學者中的容肇祖（1897-1994）、陳序經（1903-1967）、容希白（1894-1983）等人，諮詢陳受頤他們是否合適的人選。²⁹ 至1934年5月18日，有關人事聘用專案仍未有著落。康寧委托適時在北京的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與胡適討論「香港大學中文講師事」。胡適修函向康寧推薦陳受頤與容肇祖，讓他們先行啟程前往港大考察，著手制定

²⁶ W. W. Hornell, "A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 Reader in Chinese," December 18, 1932,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Drake, Rev. F. S..

²⁷ F. S. Drake, "Letter from F. S. Drake to W. W. Hornell," April 22, 1933,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Drake, Rev. F. S..

²⁸ 有研究指出，康寧於1933年是先到上海與林語堂見面，得林語堂引薦後才轉到北京向胡適尋求協助。見趙靖怡、席雲舒，〈胡適、陳受頤往來書信考釋〉，頁69。不過，胡適於1926年已舉薦康寧出任審議中英庚款的董事會成員，二人或早已認識。

²⁹ 胡適，〈胡適致陳受頤函〉，收入胡適著，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卷2，頁335。

具體的發展方案。³⁰ 有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藍圖後，會更有助於港大聘請合適的人選。

陳受頤與容肇祖答允出任港大校外評審專家，他們於 1934 年 6 月 19 日提交了課程素質檢討報告，把推行白話文作為官方中文書寫語言為宗旨。同時，他們也強調，任何健全的大學中文教育都應該包括現代國家語言（國語）的訓練。這份報告用意在於為香港大學課程改革，為如何貼近中國國內實情的長遠發展方向指點迷津。³¹ 這份報告交到港大後，校方當局自然希望執筆的陳受頤本人能夠親自執行所擬訂的計劃，故向陳受頤直接發出了聘書，並且表明即使只是到職一年，港大也願意遷就、予以聘請。讓港大再次失望的是，陳受頤最終還是因無法離開北京超過一年，拒絕了港大的好意。³² 陳受頤當時任職於學術重鎮北京大學，並出任歷史系系主任一職。除了每月 800 港元左右的薪金或可作為一點小小的誘因外，根本沒有其他更好的學術理由吸引他轉職港大。

在陳受頤婉拒港大的招聘後，康寧表現得頗為沮喪，甚至坦言對尋覓人選感到很厭倦。³³ 或許是出於責任心與私人友情，胡適繼續幫助康寧尋覓人選；他在寄給康寧的信函裏指出，他跟陳受頤都認同港

³⁰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卷7，頁116-117。

³¹ Chen Shou-Yi, Yung Chao-Tsu, "Report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bmitted to the Vice-Chancellor by Chen Shou Yi and Yung Chao Tsu," February 26,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oranda Vol.1 1928-1935, No.81, pp.7-10.

³² 陳受頤未能到任的消息，經由胡適以信函轉達康寧。目前香港大學檔案館所藏的胡適來往書信，暫仍未見收錄於目前所見的胡適文集或書信集。Hu Shih, "Letter from Hu Shih to W. W. Hornell," May 10,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ü Ti-shan Collection.

³³ W. W. Hornell, "Appointment of a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May 11,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ü Ti-shan Collection.

大中文教育需要進行改革。胡適繼續為港大當局穿針引線找到的人選分別是許地山和陸侃如（1903-1978），並貼心地交代二人的各自專長及適宜擔當的職務。³⁴ 除了寫信引薦外，胡適也親自陪同特意到北京的港大文學院院長羅便臣（Prof. R. Robertson, ? - ?）與兩名候選人把臂同遊；這實際上就是一場非正式的面試工作。³⁵ 最後，港大落實許地山出掌中文系改革課程的決定。港大這所由英人管理的大學，從此有了好像胡適這類學貫中西的人物帶領其文科教育，使之能夠跟上中國國內的文化教育。

在文教界來說，為不同的學術機構推薦人才原是尋常不過的事。香港大學首任校長儀禮（Charles Norton Edgecumbe Eliot, 1862-1931）也曾向胡適舉薦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任教北京大學。胡適的〈南遊雜憶〉便記下了他與港大首任校長的交情，當年儀禮向胡適推介鋼和泰，得胡適之助而讓北大招聘了鋼和泰。³⁶ 胡適很看重和顧念這種學界結緣、造福學林學子的教育貢獻，追憶時亦不禁慨嘆「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上的貢獻，大概要算這件事為最大。可惜愛里鶚（即儀禮）以後，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曾繼續了。」³⁷ 言下之意，他把介紹合適人選到港大任教，是再續十多年前

³⁴ Hu Shih, "Letter from Hu Shih to W. W. Hornell," May 11,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ü Ti-shan Collection.

³⁵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頁260。

³⁶ 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62。

³⁷ 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62。事實上，胡適與港大第二任校長威廉·布朗尼亞（William Brunyate, 1867-1943）也有過一面之緣。1921年9月，胡適在北大同事畢善功（1874-1946）的介紹下，曾與到訪北京的威廉·布朗尼亞會面。不過胡適對他的印象不佳，指他「乃是英國舊式官僚的絕好代表」，「談話極守舊」，更「極反對現在英國的新人物」。也許因為如此，胡適並沒有與這位洋校長有更深入的學術交流，所以才會出現「學術上的交通不曾繼續」的感慨。參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21-192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卷3，頁

與港大校長儀禮相同的功業與貢獻，也是他義不容辭之事。

毫無疑問，對胡適來說，不管是推舉學者，或者日後陪同港大教授面試許地山，可能都只是舉手之勞，但對於香港大學來說卻是猶如黑暗中找到一絲曙光。若非得到胡適的繼續幫忙，香港大學改革中文教育之路也許就此中斷。從港大的內部檔案所見，許地山於1932年曾經主動向港大申請教授一職，只是港大並未予以重視，反而把目標放在非華人的漢學家身上，以致與許地山失諸交臂。港大收到逾九十份申請書，主要都是中國學者，惟港大內部審視過相關的名單後，認為沒有一人能精通中英文而全數不予考慮。³⁸ 但事實上，作為其中一名申請者的許地山，是留學美國的，按常理推測，是沒有理由會被港大認為不精通中英文的。

香港大學由落實改革到正式聘用許地山，當中浪費了超過三年的時光。究其原因，其一是港大主事者的學術眼光不夠遠大，其二是了解中國學界的學術發展，也欠缺高等教育界的人脈網絡。如果沒有獲得胡適的幫助與舉薦，港大當局在實踐其目標上恐怕還會徒然枉走不少迂迴道路。

基於胡適多年來幫助港大，從1926年的英庚款會議到1933年的人事招聘、課程檢討，胡適都為港大的發展作出了不少貢獻。香港大學或為了答謝胡適的大力幫忙，又或者是想借助胡適的巨大名氣而進一步推動中文教育發展的成效，因此在1933及1934年連續兩年都嘗試邀請胡適南來，希望向他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胡適推辭了一次後，第二次終於答允赴港接受他人生中第一項名譽博士的頭銜。他在致傅斯年（1896-1950）的信中指出，便曾明言自己曾經「托故」推辭了一

324-325。

³⁸ W. W. Hornell, "A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 Reader in Chinese," December 18, 1932,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Drake, Rev. F. S..

次，因此「今年沒有法子再辭了，只好去走一趟」，並順道訪問廣東。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對於此行也抱有期望與計劃，故笑言自己南下香港是要「開闢殖民地」。³⁹「開闢殖民地」一語，倒不是胡適的笑言或自嘲，更是香港各界對胡適的普遍期許。

香港方面如此堅持要向胡適頒授名譽博士，很可能是推動中文教育變革的港督及港大校長欲藉胡適的大名，在港引起人們對新文學的重視，為改革方案鋪平道路。最要率先改革的，無疑是背後有在港政、學、商領袖共同護庇的中文課程體制，而要改革這個體制，則必須先從中文系的系主任人選的選用下一番功夫。港大當局與胡適對於中文課程及主事者的看法，彼此高度一致。大家均著眼於中文教育改革及將來發展，可以如何持續性地獲得進行下去的機會。如果系主任仍如賴際熙般欠缺足夠的英語溝通能力，則在各種大學層面的會議如教務會議（Senate）不能維護學系的發展權利，最致命的還是經史為主的課程已難以吸引學生入讀。至 1935 年許地山剛上任之際，港大中文系只有一名在讀學生，出現教師多於學生的窘局。⁴⁰

由上可見，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不只是上層管治者的意願，同時也是社會上普羅大眾的抉擇所致。然而，一場大規模的改革想要成功，除了靠倡議者的推動，擁護者的支持，消除反對者的對抗，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清晰的發展方向。港府的高層，港大的管理人員都有改革香港教育的志向，但多年來徒勞無功，就是缺乏一位有能力執行改革的新學之士。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香港各界都期望胡適能夠幫助他們指引方向。胡適最後亦不負港大所托，既有分享推動文學改革的經歷，也為港大聘得許地山來執行全盤的改革計劃。對於港大終

³⁹ 胡適的話是：「我的意思是『開闢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脫『通天教主』味兒了！」胡適，〈胡適致傅斯年函〉，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卷 2，頁 381。

⁴⁰ 〈港大中文系僅有學生一名〉，《工商日報》第 3 張第 1 頁，1936 年 1 月 18 日。

於聘得合適人選，胡適也有點自鳴得意，自言為港大作了一件好事。⁴¹

三、胡適訪港：行程與交際網絡

胡適訪港之旅於1935年1月進行，他的訪港消息一出，便受到香港社會上下高度重視。在他抵達的當天，社會各界熱烈歡迎，在香港首富、華人領袖何東（1862-1956）為胡適安排的歡迎宴會上，雲集了香港政商學界最為重要的人物，場面極為盛大。胡適訪港的五天，除了出席港大頒授名譽博士的典禮外，每天都儼如國家領袖般馬不停蹄地接見香港各界代表、發表演說。

然而，關於胡適訪港，粵省、上海諸地的報刊卻多有負面及片面失實的報導。如廣州《民報》所刊的，主要是指胡適的演講如何引發香港在地社群與輿論界的不滿：

胡適在港演講，反對讀經，頗遭粵當局忌。因粵方提倡讀經，胡連日在港演說，多失言，尤受人攻擊。港輿論界均無好評。《民國日報》謂胡為帝國主義張目，作淆亂觀聽宣傳，且侮辱粵人，有失學者態度，港報亦多貶詞。⁴²

但恰恰與之相反，香港的流行報紙如《工商日報》，則以〈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為名，以系列文章組成了新聞專題的形式，作出詳細的報導。其中一則云：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日由滬乘輪南下抵港。即日何東

⁴¹ 胡適在日記中是這樣寫的：「此事由我與陳受頤二人主持計劃，至今一年，始有此結果。」參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頁260。

⁴² 〈胡適在港演講發生反響：香港輿論界均無好評論、中大嶺大講期臨時中止〉，《民報》第1張第3版，1935年1月10日。

爵紳設茶會在香港大酒店天台歡迎。到會參加者，計有輔政司修頓、律政司阿那巴士打、華民政務司士蔑、庫務司戴萊、警察司經氏、威靈頓醫官、韓得臣工務司、山頓爵紳、華人代表羅旭和博士、周壽臣爵紳、周俊年律師、曹善允律師、高等法庭正副臬司、會督何璐、香港主教、大學堂副監督韓尼路、及中西紳商麥基、馮香泉、羅文錦、李子芳、簡東浦、何棟生、莫幹生、曾健、羅棟勳、昃士、羅文惠、關祖堯、楊國章、吉定士、顛那、些亞、梁細華、羅文顯、羅文浩、加式、史挑活、何世榮、何世儉、何甘棠、忌厘賓、屈定頓、余東璇、托彼厘亞利、譚嘉士、羅士、麥厘、尊順、加導利爵士、羅厘勤加導利、麥斜露、史東、史路士、卑路、打結、荷路、郭少鑿、佐史夫、威廉順、卑利、王德光、鄧肇堅、李右泉、莫理士、港大教授科士打、史美夫、閃順、羅便臣、富蘭士、洗、麥當奴、陳均甫、芬尼近、基士地、拜晏安尼、豪花、急巴利治、爹士沙、工商報代表、新亞通訊社代表、程、史杜泉沙、力士、威路臣、摩路、李海東、金頓、區炳光、希蘇力、屈、羅文幹、賴際熙、急布蘭尼、威路臣、亞治畢、多禾路、李亦梅、譚雅士、尹奕聲、些路頓、科厘士、喬、馬應彪、馬文輝、關耀光、韋達、施文、施玉麒等，不下百餘人，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是日胡博士並無演說，只與到會各人隨便談話，直至五時許賓主始盡歡而散。又歡迎會散後，記者趨前晤胡博士，忽忽叩以數事。據答謂新文化革命，須慢慢走去。路途是不錯的，但須當事者努力，只憑談話，不算是工作。⁴³

上述逾百人的名單，盡是香港官、商、學界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以官員來說，除港督貝璐以外，香港殖民地政府最高層級

⁴³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5日。

官員如輔政司（港督以降最高級的政府官員，等同今天的政務司司長）、律政司、警察司等各政府部門首長全數出席。在商人方面，出席者包括獲政府委任為立法局議員的華人領袖羅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周俊年（1893-1971）、曹善允（1868-1953），香港首位華人議政局議員周壽臣（1861-1959）（議政局為香港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後改名為行政局；1997年後再更名為行政會議，是特區首長的執政內閣），以及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商會——華商總會的領袖李右泉（1861-1940）等。其他華商、英商，政要名流，傾巢而出，反映了胡適訪港是如何極端哄動的事情。當天未有出席歡迎宴的港督貝璐，也在胡適領受名譽博士學位的當天邀請胡適到港督府晚宴，可見香港各界對胡適訪港是隆重相待的。

胡適除了受到政商界領袖的熱烈歡迎，香港社會各界亦爭相邀請胡適演講。在他抵港的當晚，他還要依次出席另外兩場歡迎宴會，分別是當晚七時在「華商俱樂部」舉辦的歐美同學會宴會。然後，晚上九時他要再赴香港大學文學院，參加港大校方舉辦的歡迎會。香港的報刊獲得了一份胡適在港數天的初步行程，相信是港府或港大校方預先發放給新聞界的。以下率先見於《工商日報》的行程，雖然未能全面反映在港的具體安排，但既然是事先向大眾輿論界公布，不多不少見出胡適訪港行程有其萬眾期待的新聞價值：

一月五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香港教員聯合會在告羅士打酒店請饗，饗舉乘汽車環遊、至淺水灣用茶點。

下午八時，港大教授科士打請餐、在山頂渡宿。

一月六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華人代表周壽臣、羅旭和（龢）、曹善允、周俊（俊）年在華商俱樂部請午餐；

下午八時、在韓尼露(即港大校長康寧)寓晚餐。

一月七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在港大受學位。

下午八時，港督在督轅請餐

一月八日(星期二)

下午一時，扶輪會餐會，由胡氏演講。

下午四時，乘廣九車赴廣州。

一月十三日，由廣州赴廣西梧州訪候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博士。⁴⁴

胡適在這短短的五天訪港行程中，共獲邀出席十多場聚會，發表五場公開演講，還與香港政界、商界及教育界領袖討論中文教育改革的方針。綜合報刊報導、胡適《日記》、胡適〈南遊雜憶〉以及陳君葆《日記》，胡適在港活動的情況可見表一：⁴⁵

表一：胡適在港活動表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1月4日上午	香港首富何東爵士設宴歡迎胡適。出席者有香港的主要官員包括輔政司、庫務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華人代表周壽臣（曾任清朝「奉錦山海關兵備道兼山海關監督」，後移居香港，獲提拔為

⁴⁴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5日。

⁴⁵ 胡適的行程整輯自以下文獻、著作：〈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5日；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卷1，頁141-145；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60-65；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頁165-168、184。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香港首位議政局議員)、羅旭蘇、曹善允、香港大學教授區大典(前清翰林)、前港大中文學院系主任賴際熙太史(前清翰林)、香港影響力最大的商會華商總會的前主席李右泉、李亦梅(?-?)等政、商、學界逾百人出席。
1月4日7時	出席香港留學歐美同學會準備的晚宴。
1月4日9時	於香港大學發表英文演講，題為“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文藝復興)
1月5日中午	赴淺水灣香港教員協會(Teachers' Association)，並發表英文演講。題為“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1月5日下午	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科士打(Prof L. Foster, ?-?)，曾任教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的教育家、香港官立文商專科學校首任校長巢坤霖(1885-1953)，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陪同胡適乘車遊覽淺水灣、香港島太平山頂。遊覽途中，胡適與同行的巢坤霖交流改良中文系的手方法。
1月5日晚上	香港大學教授科士打在家中設宴款待胡適，同場出席有香港聖公會主教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Hall, 1895-1975)。
1月6日上午	拜訪適時在港的國民政府要員李宗仁(1891-1969)。
1月6日中午	出席四名香港立法局議員兼華人領袖周壽臣、曹善允、羅旭蘇、周焯年為他準備的宴會。
1月6日下午	到華僑教育會演講，以國語演講，題為「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胡適當天致信夫人江冬秀(1890-1975)，直言當天演講經歷使其很感動、很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高興。
1月6日晚上	在康寧的香港大學校長府邸晚宴。
1月7日下午	胡適出席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學位典禮。香港大學校長康寧授與胡適名譽博士，同場獲頒名譽博士的有港督貝璐。
1月7日晚上	應邀到港督府與貝璐晚飯。
1月8日早上	拜訪時居香港的國民黨元老及政要胡漢民(1879-1936)，談話一個半鐘。胡適〈南遊雜憶〉記下了他面見胡氏說了一句話「武官不要錢，文人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1月8日早上	參觀聖保羅女校，與該校校長胡素貞(1890-1979)交流。胡素貞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香港的資深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香港首名女博士，同時也是香港首名獲得英皇勳章的女性華人。
1月8日中午	出席「香港扶輪社」的聚會。當天出席者不少是香港社會上著名的華洋政商領袖。「扶輪社」還邀請了不少港大畢業生出席。胡適發表英文演講，題為“Has China Made Progress during these 20 years?”
1月8日下午	與巢坤霖、香港華文視學官羅仁伯(1888-?)一同乘車遊覽九龍。胡適與巢坤霖、羅仁伯交流白話文及運用國語教學的看法。
1月8日下午	到香港地位最崇高的華人領袖周壽臣家中茶聚。
1月8日晚上	到銀行公會出席由銀行家鄭鐵如(1887-1973)安排的晚宴。晚宴後，胡適乘船返回廣州，陳君葆及巢坤霖均有送行。
1月25日晚上	胡適由廣州抵港再轉船北返，鄭鐵如、巢坤霖、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益世報》社長生寶棠（?-?）、港大文學院院長科士打到場送行。

綜上而言，胡適是次南下訪港，固然是香港城中盛事，相信也是胡適人生早期階段裏其中一件使其感到十分得意的美事。他的弟子兼好友傅斯年曾以「我這當年在廣東請你不去」為由，略有醋意地勸阻胡適不要南下香港。⁴⁶ 但胡適並沒有理會傅斯年的勸告，還打趣請傅斯年不要笑他不脫「通天教主」味兒來「開闢殖民地」！⁴⁷ 由此可見，胡適亦以「平民主義」對待香港，即使是好像香港這被時人視為文化落後的「殖民地」，他也說到做到，不分貴賤文野，值得自己抽出寶貴的五天時間去一趟，讓「新」文化遠遠落後於內陸的香港沾染新風，⁴⁸ 使各階層群體都在他「有教無類」的精神下，獲得他這位新文學「通天教主」點撥教化，故此欣然赴約。相信胡適自己也沒有預期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的知識界與教育界是那麼熱切期待著他的到來。

⁴⁶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收入傅斯年著，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卷2，頁640。

⁴⁷ 胡適，〈胡適致傅斯年函〉，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卷2，頁381。通天教主四字，原是他人贈予胡適的稱號。在1922年一場宴一會中，邵子政（?-?）稱胡適為「白話詩的通天教主」胡適欣然認同。據胡適日記所述，「通天教主」是《封神演義》中的角色，是一個「一視同仁的平民主義者，他的門徒也盡有成仙成佛的畜生」。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21-1922）》，卷3，頁166。

⁴⁸ 新文化乃至白話文一直未能在香港普及，是有其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造成。早在新文化運動剛發軔之時，香港也曾孕育出新文化的響應者。據陳國球的考據，於香港仁仁書院及英皇書院接受英式教育的袁振英（1894-1979），曾響應新文化運動撰寫〈易卜生傳〉投稿《新青年》，文章發表時更得到胡適在按語中表揚。袁振英也不時撰文投稿香港報章將西方思潮介紹給讀者。不過隨著舊學被政府納入官方教育制度內，新文化在舊文化的圍堵下寸步難行。侶倫（1911-1988）在1936年撰寫〈香港新文壇的演進及展望一文〉仍感慨舊文學勢力盤踞文壇。參陳國球，〈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香港的抒情史》，頁155-158。

四、香港政商界對胡適的觀感

(一) 港督與港大校長的推崇

胡適來港雖然有眾多的應酬、交際及學術活動，但他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是到港大領取名譽博士學位。1935年1月7日，他出席港大的名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這是他此次南行日程的重頭戲。名譽博士是香港大學頒授給個人的最高榮譽，獲頒授者全是在政、商、學界舉重輕重的人物。舉例來說，1933年獲頒名譽博士的，有香港首位華人議政局議員周壽臣、港大校長康寧、時任香港律政司金培源（Joseph Horsford Kemp, 1874-1950）等六人。⁴⁹ 1935年與胡適在頒授典禮上共享殊榮的，正是港督貝璐。按照慣例，港大的名譽博士典禮交由校監主持，香港總督是港大的必然校監。由於貝璐同場受頒博士榮銜，故港大請來早於1916年獲頒名譽博士的何東擔任主禮嘉賓，以示隆重其事。⁵⁰

典禮上，港大校長康寧的獻辭是如此介紹胡適的：

胡博士為中國文字復興之始創者，在中國歷史上，胡適博士之盛譽，刻於墨瀋中，永不能遺矣。中國現在之難題，已為世界所重視。本人亦深信中國將來之難題之解決，胡博士亦與有關係。港大今日賜以榮銜，將來亦當與有榮焉。港大更有較切之理由感於胡博士者，蓋其曾為港大漢文編纂漢文應如何入軌道，現在尚在指導中，嘗有問港香非中國，何求漢文進步於港大，本校之答案，港大為一專門學院，而求學者多來自中國，

⁴⁹ 相關資料見於香港大學學位頒授典禮網站，<https://www4.hku.hk/hongrads/tc>，瀏覽日期：2023年7月25日。

⁵⁰ 〈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禮，貝督與胡適博士均獲榮譽學位〉，《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8日。

故漢文一科，必不能缺乏，抑亦不能不謀進展。今日胡博士在座，本人敢謂港大漢文，必有復興，雖或收效較微，然其必有相當進展也。⁵¹

康寧的獻辭，把港大頒授博士學位給胡適的箇中原因道明。對於胡適在過去支持港大發展及協助將中文教育導入正軌的幫助衷心致謝。貝璐致辭時，對胡適也推崇備至：

……今次獲賜博士榮銜，適與胡博士同時獲賜之機會，更倍感欣幸。胡博士之聲譽，中國無雙，且為遠東無不崇拜者。副監督頃間所言，胡博士為港大編纂漢文應如何入軌道，極為感激。胡博士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學者，港大既得其助，斯誠贊助胡博士復興之計劃矣。⁵²

出席典禮的嘉賓近千名，除何東本人出任主禮嘉賓外，政府最高層包括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教育司等高官，香港四名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代表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周俊年等亦有出席，場面十分盛大。⁵³

貝璐在講辭中，除了大力稱讚胡適及感謝胡適對港大改革中文教育的貢獻外，亦重提港大對於「為中國造就人材」、促進「中英邦交」、「增進中國學子之利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香港教育最高的決策者相當重視港大為中國培訓人才的功能。正是這個原因，港督貝璐與康寧擔心香港的中文教育如不改革，最終是不能夠與新興的國民政府

⁵¹ 港大校長的演講原為英文，本文採用《工商日報》的譯文。〈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禮，貝督與胡適博士均獲榮譽學位〉，《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8日。

⁵² 港督貝璐的演講原為英文，本文採用《工商日報》的譯文。〈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禮，貝督與胡適博士均獲榮譽學位〉，《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8日。

⁵³ 〈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禮，貝督與胡適博士均獲榮譽學位〉，《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8日。

所要求的教育方案配合，只會顯得越來越落後和增強彼此的隔閡，造成訓練的人材未能切合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而港大培養的畢業生未能進入中國的官場或社會體制，反過來是不利於維護大英帝國的在華利益。當然，港大的學生如果未能學以致用，也直接局限了港大生源的質與量。

基本上，1930年代初期由港督、港大校長與校內高層甚至是華人紳商與社會大眾，對港大中文教育都有了一些異於金文泰時代的看法。由此觀之，胡適對港大的幫助以及親訪香港，意義非凡。他為香港的中文教育設定了發展方向與指標，在肯定港府及港大領導層的文化方針的同時，也提高了「中文」在香港的地位。頒授禮結束後，胡適與貝璐一起在港督府共進晚餐。⁵⁴ 這一切於國內經常出入官廳甚至宮廷的胡適本人而言，是毫不新鮮而平常不過的事，但對於百年來華人地位不高的香港而言，也是當時的報刊新聞價值所在。

不過，對於胡適訪港的在地迴響與歷史意義，還需要從上而下地放眼至其他層面，如此方能有更清楚的了解。

（二）扶輪社：華洋社會領袖的贊譽

胡適在港首兩天的演講，聽眾主要為港大學生以及前線教育界人員。在1月8日，胡適獲邀在香港扶輪社餐會上演講，扶輪社當時的成員是由香港上層社會的英人及華人領袖組成。從當日報導所列舉的會眾名單來看，出席者除扶輪社的會眾外，亦有為數不少的港大畢業生出席。是場演講在中文報紙雖只有簡短的報導，而胡適在日記也只有簡短數句記載，但以華洋精英為閱讀對象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則作了十分詳細的報導，內容差不多佔了整版報紙的篇幅。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胡適的學術言論與思想觀

⁵⁴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頁167。

點，是如何受到香港精英階層的重視。

時任扶輪社的會長為香港華人領袖羅文錦（1893-1959）律師，他本人是歐亞混血兒，出任多項公職，包括東華醫院主席、亞洲足球協會的創會會長，在1935年起出任立法局議員。在胡適發表演講前，羅文錦交代了胡適到訪香港的因緣，熱情讚揚了胡適在推動中國發展的巨大貢獻。在羅文錦的介紹辭中，他稱讚說：「胡適博士是中國公認的學術領袖；胡博士不但是學者與哲學家，更是中國現代思想與運動中活躍而強大的領袖者。」⁵⁵

羅文錦讚揚胡適是新文化的先驅者，透過文學改革推進知識普及化與文藝復興。⁵⁶ 在他的讚辭中，胡適推動文學改革的目的，是讓中國人能吸收各種新思想，在化學、物理、衛生、醫學、工程等各個科學領域得到發展，進而提高中國數百萬人的生活水平。從羅文錦的讚辭所見，胡適的地位已經由知識界的領袖提升為引領中國現代化、並且透過科學、教育興國強國的先鋒角色與愛國領袖。不可忽略的是，他也公開肯定胡適本人是十分精通中國傳統學問的，對舊學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人。⁵⁷

身為香港大學董事局成員之一的羅文錦，他對胡適的褒揚，除了是說給胡適聽之外，在我們看來更是有意說給在座的華洋領袖及港大畢業生聽。言下之意，中國已經全國上下都在努力革新，高等院校的學術思想在科學精神下已進步神速，但香港的中文教育則仍然停留在

⁵⁵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9 January 1935, p.10.

⁵⁶ 據歐陽哲生考證，胡適於1926年訪英時巡迴演講期間，已多次使用「文藝復興在中國」為題演講，並將「中國文藝復興」與中國現代化運動聯繫起來。自此英國及香港的英文報章多以「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稱呼胡適。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頁228。

⁵⁷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p.10.

二十年前中國的經史之學。弦外之音，就是香港應以胡適為師，急起直追。

在羅文錦的開場白結束後，胡適接著演講。胡適是晚演講主要圍繞五個主要方向展開：「香港景色」、「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政治改革」、「語文改革」、「教育進步」。精通演講的胡適很懂得捕捉聽眾的心理，在正式展開其主題前，他客套地先讚美香港景色如何秀麗，也呼籲香港各界要透過詩歌、繪畫去紀錄香港風景之美。在進入正題時，胡適提出一個問題：「二十年來，中國有沒有進步？」⁵⁸ 胡適並非自問自答，而是展示出兩種視角，有歷史視野的人，能與古今對照，就會認同中國的進步；沒有歷史視野的，就不會看得出個所以然。所謂進步，實在是一種過去與現在的比較。胡適先從傳統說起，有意識地以纏足作為例子，說明女性擺脫了長期所受到的傳統束縛。廢除纏足，意味著中國社會拋棄了不合時宜的舊文明、舊風俗，進行了文明及必要的現代化改革。接著，他話鋒一轉，提到在港大的畢業禮上，看見不少年輕女性得以在大學的殿堂上獲得最高的學術榮譽，這正是女性地位轉變的明證，也是香港社會先進性的一面。然而，港大與香港社會當前所需要的，便是對現代中國的進步要有更為中肯的認識。

胡適的演講以「政治改革」、「語文改革」、「科學進步」為切入點，列舉一連串例子，將中國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娓娓道來。胡適自言年輕時要用七天艱苦的旅程才能由家鄉到達上海，如今乘汽車只需要六小時便可以了。他又指出，昔日基於傳統宗族家法，離婚是不可能的事，但到今日訂立了法例，規定可申請離婚的理由，讓男女同樣獲得人生權利，不再苦受傳統家庭觀念的束縛。胡適演講的重心，是著意告訴香港的聽眾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的進步是如何巨大的，而這種進步正

⁵⁸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p.10.

是來自膽敢破除那些已過時的舊傳統。但誠如羅文錦的介紹，胡適的傳統舊學是一流的，他本人並非為反傳統而反傳統，他正因為深知傳統，才知道什麼需要保留，什麼應該拋棄；透過破舊立新，才能迎來更美好的中國。⁵⁹ 羅文錦之言，是要透過胡適向在場聽眾傳達當前社會對於新舊文化應持守的正確態度。

胡適還與讀者分享了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並將近年的科學發展稱為中國科學的復興（scientific renaissance of China）。但他強調，科學的復興必定基於思想思維的突破、科學精神的培育，而這些又建基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語言文字改革、教育事業的發展。胡適十分自豪地指出中國在二十年裏於教育事業上的顯著進步：

小學學生人數增加了五倍，中學生人數增加了十倍，大學生人數增加了一百倍。民初只有三所大學，但現在全國已有 111 所學院和大學。……中國的科學家在許多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在地質學方面，我們可以很放心地說已經趕上了世界的前進步伐，並且正在為整個科學界做出公認的、權威的原創性貢獻。⁶⁰

羅文錦對胡適的介紹及報刊於事後的報導重點，均很能夠把握胡適的現場演說要義。胡適還以「二十三年來中國的科學進步」為主軸，十分具體地透過各種實證和例子說明「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成就。他在演講中也肯定了民國新政的意義——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的二十三年，正因為專制皇權解體，中國才能在教育上、思想上不再受八股文或文言文的桎梏。當有了語言文字的改革空間後，文白之爭才能浸

⁵⁹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p.10.

⁶⁰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p.10.

浸然興起，從此迎來國人的思想革新，次第而有了科學思想上的革新。可以說，國人的科學精神的進步，必定是建基於白話文取代了難以傳達科學知識的文言文的發展，這樣便迎來了眼前中國在化學、物理、衛生、醫學、工程和西方社會科學等新知識、新思想的進步，這才真的能夠讓中國有望躋身在工業、商業發達國家的前列，同時也是提升千萬中國人生活水平的關鍵因素。

要之，胡適的演說，一方面如實說出了中國進步的歷史脈絡及源由，另一方面也讓華洋領袖聽眾了解到，中國的新生與現代化社會的進步、工商業的發展等等，都與作為思想、文化、制度的載體的語言文字的改革息息相關。因此，他的演說與其說是要如何著意展示民元以來中國有哪些科學上的進步，毋寧說是要告訴聽眾們香港一域如要有新的進步，便必需要打破舊傳統——改革文言文以推進白話文教學，並且推動國語教育。

在胡適的演講結束後，香港另一位舉足輕重的華人代表羅旭蘇向胡適致感謝詞。羅旭蘇本人也是歐亞混血兒，公職生涯甚長，歷任六任港督；曾先後出任立法及議政兩局議員，並獲英國爵士榮銜，深受香港最高管治階層的倚重。他也熱情洋溢地感謝胡適為大家帶來富有意義的演講。他的論調與羅文錦如出一轍，將中國二十年來的在文化上、社會上、經濟上的進步歸功於「中國文化復興」，再進而說明開創新的道路，並不需要捨棄舊有的文化。羅旭蘇讚揚胡適「熟識傳統學問，了解到濫用舊學會帶來的束縛，因此有勇氣去解放自己，進而努力從傳統舊學中解放其國民。」⁶¹ 單從羅旭蘇對胡適的評價，或許會以為他是思想開明，支持新文化的領袖，但其實他就是經史教育制度化的重要推手之一。

⁶¹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p.10.

1925年6月，因應上海爆發五卅慘案掀起反英浪潮，香港爆發長達16個月省港大罷工，當時不少中學生響應工潮，跟隨工人離開香港。短短數月，香港七十萬人口中，有超過二十五萬人離港抗議，投身反英抗暴的大罷工潮流。羅旭龢與周壽臣作為港府最信任的兩名華人立法局議員，一直協助港府維持香港社會的運作。1925年10月，羅旭龢針對省港大罷工撰寫的報告書，詳細列出香港在未來應如何應對，其中在「政治在校園（Politics in Schools）」一項，他的建議是利用儒學這個最有力的保守力量抗衡布爾什維克思想。⁶²就在1926年開始，經史儒學成為香港大學的入學試的必答題——這也變相地把中國的傳統學問、經史之學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1926年成立的官立漢文中學，其中文課程便是徹底地以經史為綱要，讓傳統儒學成為教育制度一部分，這間接開展了香港備受批評的守舊學風。但是，這反過來也是傳統經史之學獲得港英政府重視，從而得以在社會推展的重要因素。羅旭龢的構想與主張，實在是可圈可點；但這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故姑且從略。

如果從表面或現象上觀察羅旭龢的中文教育觀點，這位曾經以政治原因而在背後推動經史、儒學發展的港府智囊，對於胡適改革白話文以推動中國發展的功績卻又推崇備至，看似是十分自相矛盾的。但是，實際上這只是羅旭龢因應時空、時局的不同而有因時制宜的適時舉措罷了。1935年的中國，早已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與1926年南北對峙，軍閥割據的中國大為不同。在新形勢下，香港在方方面面都需要顧及中國的看法。尋常事諸如人事招聘，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王寵惠（1881-1958）曾私下以非官式的形式向英國駐華領事藍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1880-1964）要求香港大學增加「中國元

⁶² R. H. Kotewall, "Hong Kong, Strike and Boycott," October 24, 1925,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489, p. 455.

素」。⁶³ 港大當局表示欣然接受有關建議。⁶⁴ 港大改革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本來就是將課程改革至切合中國主流模式，實踐港大為中國培養人才而設的建校目標。

羅旭龢和羅文錦二人都曾先後獲委任為港大校董及立法局議員，他們都是政府賴以諮詢民情、連接港府與華人社會的華人代表。他們的觀點可以說，既反映港府及港大的觀點，同時也代表了華人紳商及民眾的求變心聲。和羅文錦一樣，羅旭龢讚揚胡適熟知中國傳統學問，因此能夠在保留中國文化的同時推動中國迎向科學的道路，都是有弦外之言。他所暗示的，就是告訴香港仍還在保守勢力知道，胡適在中國推動白話文，推動知識普及化的道路，是可以在不否定傳統舊學的前提下在香港實行。

五、胡適訪港在教育界產生的迴響

（一）傳統經學支持者對胡適的觀感

香港在 1930 年代正處於新學與舊學交替之時，政府及港大雖想徹底改革，但缺乏合適的領軍人才及面對社會上的阻力，改革之路只能緩慢進行，不能一蹴而就。胡適訪港對於支持新文學一方來說，無疑是一支強心針；但對於舊學支持者來說，胡適卻並非受到一面倒的反對。

⁶³ Milles Lampson, "Letter from Milles Lampson to William Peel," March 11,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p. 39.

⁶⁴ 當時港大有兩個空缺，分別為病理學講座教授(Chair of Pathology)及歷史學教授(Readership in History)，康寧致貝璐的覆函稱將於中國招聘。William Peel, "Letter from William Peel to W. W. Hornell," April 8,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p.23.

胡適挈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在中國國內或國外演講，都不留情面地批判各種「守舊勢力」。他是次訪問香港，也沒有刻意避諱對「守舊勢力」的批評。⁶⁵ 一眾熱情接待他的華人紳商與前清翰林，在1927年訪港的魯迅（1881-1936）筆下便是被譏諷的「守舊勢力」。直至胡適訪港，這批「守舊勢力」仍是同一批人馬；他們佔據了香港文壇與教育話語權。異於魯迅訪港時與他們緣慳一面，胡適卻與他們一一見了面。前清翰林對胡適的學說主張縱或各有不同觀感，但整體上的看法還是不錯的，尤其是一些舊學知識社群在接觸胡適後還產生了一些好感。

在胡適訪港首天，何東為胡適舉辦歡迎會，居港的前清翰林們亦聯袂出席與胡適見面。這些前清翰林本來基於彼此的學術立場與政見不同，本不欲會見，但可能礙於何東這名香港首富及華人領袖的顏面與交情，最後是如約出席。在與胡適見面後，他們對於胡適的觀感也不是一面倒的抗拒。據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陳君葆所言，區大典雖然認同救文盲要用白話文，但視「白話文學甚於洪水猛獸」，⁶⁶ 另一名前清翰林羅憩棠（1871-1953）也認為翻譯外國書籍須用白話，但如果容許了白話文發展，「他日不知禍害伊胡底止」。⁶⁷ 對於當時推崇文言文及舊文學的保守氣氛仍然高漲的港大而言，陳君葆在日記裡指出：「大學裏對於胡適的文學革命論調顯分兩派意見，大派是鄙薄他的白話文學，一派是推崇他文學的見解。就香港的情勢論，大有採取

⁶⁵ 1935年1月4日，胡適香港大學主講〈中國的文藝復興〉。他的演講主要是要介紹白話文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但仍觸及了經學與科舉制度。他批評了「讀書人」為考取功名而「窮年累月的去熟讀四書五經」，「不惜花費了一生的精力來求熟習這死文學」。然而，當時在港大任教中文的前清翰林，正是胡適所述「熟讀四書五經」、「熟習這死文學」的「讀書人」。胡適，〈中國文藝復興〉，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4。

⁶⁶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頁143。

⁶⁷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頁143。

折衷論的需要。」⁶⁸

不過，至 1935 年 1 月 15 日的陳君葆日記所記，他指出了讓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說也奇怪，崔百樾先生下課後到來談話，問起我於胡適所倡的白話文學的意見來，他告訴我他是同情於拿白話文學來做普及教育，解除文盲的工具這層意見，但是他不大清楚胡適所取的路徑怎樣，所以要和我討論一下。後來我說明了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他便爽快地直截地說：「以今繙古我也是贊成的，譬如拿語錄體來整理中國哲學部門何嘗不可以。」⁶⁹

陳君葆日記的記錄，可以理解為胡適訪港後引起了前清翰林崔百樾（?-?）對於白話文的性質及其價值多了一些認識及認同。區大典與胡適會面後，也對胡適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並稱讚胡適「吐屬極不錯」。⁷⁰ 區大典的改觀，既可能是胡適的氣度讓他折服，也可能是與區大典對白話文持較為開放的態度有關。因此，在 1932 年港大展開中文教育改革時，校方讓賴際熙自動流失，卻留下區大典繼續任教。

總體上，被視為思想守舊的前清翰林在接觸胡適後，對白話文的抗拒減輕了一點；然而，港大的學生在聽過胡適的演講後，對艱深的傳統經學的不滿，也就相對地增多了一點。陳君葆日記記載了他的學生親歷胡適演講後的感受：有學生指「一比較胡、區二人演講，就能看出優劣；一人指『區老師』講來講去總不外那一套話」，還有一個對經學反感的學生陳錫根（?-?）直指經學「簡直是騙人的東西」。⁷¹

胡適對前清翰林及舊學的批評，在新舊並存但舊學仍然聲勢浩大

⁶⁸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 1，頁 144-145。

⁶⁹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 1，頁 146。

⁷⁰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 1，頁 143-144。

⁷¹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 1，頁 159。

的香港，自然也會惹來時人維護經學的抗議。在1935年2月，在香港第一所官立漢文中學的頒獎日上，學校所邀請的主禮嘉賓是香港著名律師胡恒錦（?-?），他為文言文辯護甚力，堅稱「文言文並不是死文字，白話文又不是活的語言」。⁷² 及後，胡恒錦更撰〈白話文與經學〉一文投稿《華字日報》公開反駁胡適：

文言之體裁不一。且我國文言，體制不一，有簡明者、有深奧者、有雕琢駢儷者、亦有淺易者。胡博士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之「胡適日記」，迨上述之淺易文言也。以國語式之白話文較之，則不可以道里計矣。胡博士在港大演說，力持中國文言為已死文字。夫文字者，一國之人或一民族所同用以發表其思想或傳達其思想者也，推斯意也。凡所用之字，未經廢棄而不用者，則其文字不得謂之已死。今白話文所用之字，亦即文言文所用之字，此足為文言未必死之實證。蓋事實上白話文所用之字，與文言文所用之字，並非劃然兩歧。白話文實各文體中之一體，任作者自擇耳。白話文最宜於膚淺小說，以供識字無多者之披閱，原非新創之文體。蓋五百年前所著之水滸傳，及二百年前所著之紅樓夢，國語文之極詣者也。兩書作者，皆邃于文言，始克成此佳構。予在漢文中學頒獎，嘗謂非邃於文言者，其語體文必無可觀，可為例證矣。蓋白話文有時適用，亦有時不適於用，斷非無施而弗宜者。觀胡博士著述日記，亦避用白話，可以深長思矣。⁷³

胡恒錦撰〈白話文與經學〉一文的目標，在於提倡讀經承傳孔孟

⁷² 江南雪諦，〈香港的教育：獻給胡適之先生〉，《人民評論旬刊》第75號，1935年4月12日，頁34-35。

⁷³ 胡恒錦，〈白話文與經學二〉，《華字日報》第2張第4頁，1935年3月22日。

之道，只有讀原文才能精通義理。⁷⁴ 若使用白話文，則「道德學術亦將廢墜」。⁷⁵ 胡恒錦以胡適日記使用淺白的文言來反駁胡適「中國文言為已死文字」的說法，事實上他並不了解胡適的學術思想。胡適舊學根底很好，胡適在演講中所反對的，是少數讀書人要窮年累月地去熟讀四書五經而忽略掉其他學問；胡適倡導的中國文藝復興，是「給與人們一個活文學，同時創造新的人生觀」，⁷⁶ 是迎向大眾而不是少數讀書人的。

總括而言，胡適在香港公開發表了五場學術演講，社會上的響應者與支持者遠比反對者多。

（二）華僑教育會與教育官員：前線教育人員對胡適的期望

胡適的新文化領袖聲譽，遠近遐邇，香港教育界的學校前線教師對其人其學早有耳聞，故對他首次訪港充滿期待。胡適除了在一月五日上午用英文向西人教師協會演講〈中國的文藝復興〉外，也在訪港的第三天中午，應香港九龍三十多間學校的聯合邀請，為三四百名中小學教師特備一場國語演講。華僑教育會的代表奉函胡適，希望他能夠對旅居香港的「八九十萬思想落後群眾」，作出「發聾振聵之言」。對於這場演講的籌備經過，香港的報刊也作出報導，並把教育界代表邀請胡適演講的信函刊布。藉此信函，我們可以了解香港的知識界對於胡適訪港的殷切期待，同時也可以一睹香港在地知識社群於 1935 年前後追慕新文化氛圍的一斑。有關信函如下：

⁷⁴ 胡恒錦與香港大學也有不少淵源。據港大校長康寧致港督金文泰的信函所見，胡恒錦為香港大學規劃中文文憑課程時出力不少，也協助香港大學向其富有的兄長胡禧堂（?-1932）籌款。W. W. Hornell, "Letter from W. W. Hornell to C. Clementi," October 19, 1928,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20/File 3, pp. 54-57.

⁷⁵ 胡恒錦，〈白話文與經學三〉，《華字日報》第 2 張第 4 頁，1935 年 3 月 23 日。

⁷⁶ 胡適，〈中國文藝復興〉，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 5，頁 3。

素仰先生為吾國教育導師，眼見此地七八萬智識饑荒的學生，應有憐而教之之意，先生又是世界文化的領導者，對此僑港八九十萬思想落後的群眾，必有發聲振聵之言。我想先生這回南下動程之前，早已算到此着，而攜帶了一個特大的木鐸來了。我們想請益的萬緒千頭，現在僅擇一個當地教育上急宜糾正的問題，就是「語體文與香港」，敦請先生講演。提撕提撕，先生為吾國文體的革命家，二十年來，一般青年如雲從龍，中華民國僅存一股新氣，惟此而已。然而咄咄怪事，香港一隅，却同化外，至今學校鄙薄白話，和五四運動以前一模一樣，固由遺老作怪，亦緣遺少糊塗，先得先生登壇棒喝兼施，叫大眾豁然頓醒，此功德不可思量。史稱老聃出關，關尹挽留，要他老人家書傳道德五千字，成為千古佳話，今香港正是南粵之一關門也。我輩僑眾，在此守關，欣逢先生高軒，時不可失，乞留嘉言。⁷⁷

對於這場演講如此盛大及各方的熱烈反映情況，應該是超出胡適本人的預料，他於當晚致信妻子江冬秀，與之分享感受時洋洋得意之情溢出紙端。他如此描述講座盛況及會後感受：

聽的人是三四百中國中小學教員，講完後他們搶著拿小冊子來叫我簽個名字在上面做紀念，又拿了許多紙來請我寫字。我寫的手都酸了。但我心裡覺得很感動。他們敬重我，使我心裡覺得我不會說他們的話是很對不住他們的……南方少年人對我很好，中年老年人當然對我很客氣。⁷⁸

⁷⁷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5日。

⁷⁸ 胡適，〈胡適致江冬秀函〉，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卷2，頁387。

胡適在演講及宴會以外，還抽了兩天時間乘車遊覽香港的山色美景。負責接待的是香港教育署的前線官員羅仁伯、余芸（1890-1966），羅、余二人都是香港教育署高級視學官，另亦有教育家巢坤霖，⁷⁹ 港大教育系教授科士打等。他們在駕車與胡適同遊時，也趁著這個寶貴的機會向胡適請教「改良中文系的入手辦法」。⁸⁰ 胡適在日記裏還記下了他們的遊覽情況：

巢坤霖先生約同羅仁伯先生（華文學校的視學）同車遊九龍，詳談此間學校用國語的問題。羅君不甚贊同國語，故巢君邀他來與我遊談，要我勸導他。我們談得很好。⁸¹

有關胡適與執行港府教育政策的前線官員談及的白話文、國語語文政策的問題，胡適在〈南遊雜憶〉裏有詳細記載：

羅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學校的視學員，他是很虛心考慮這個中文教學問題的，他也不反對白話文。但他所顧慮的是：白話不是廣東人的口語，廣東兒童學白話未必比學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學文言更有用。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顧慮。廣東朋友往往有這種見解。其實這種意思是錯的。第一，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因為流行最廣，又已有文學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學，學了也最有用……國語實在比古文豐富的多，從國語入手，把一種活文字弄通順了，有志學古文的人將來讀古書也比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學中學若徹底改用國語課本，低級修業年限或可以縮短一二年。將來謀中文學校與英

⁷⁹ 巢坤霖是著名教育家，在港接受中學教育，後赴英國留學。學成後返國，於北京清華學校任教。1921年回港加入香港教育署，後出任香港官立文商科學校校長。黃振威，《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頁230。

⁸⁰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頁143。

⁸¹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頁167。

文中學的銜接與整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一個救濟方法——所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家，很誠懇的希望他們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⁸²

不過，香港的中文教育未能與內地主流學制接軌，政府教育司署的官員以至港大管理層都難以對症下藥。至於箇中原因，與時局因素有關外，依次而至的問題恐怕是儘管當局有心改革亦不得其人、不得其法。一俟中國大陸政局轉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隨之而變，因此也就有了胡適所說的「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有此擘劃，方才有胡適的出場，由他向港大推舉陳受頤、容肇祖這「兩位中國學者來計畫中文系的改革事業」。⁸³ 接連而至的，便是胡適的親自訪港，進入香港學界的最高殿堂獲頒最高學術榮譽，這變相也為白話文、新文學與新文化在香港的發展鋪平了一些道路。

在面對香港開始進入新舊交替的階段，⁸⁴ 胡適的感覺是正面和樂觀的，但也不忘諄諄告誡香港一群熱切希望改革香港文化風氣的教育界同人在「接受新的文化，做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的同時，也要「以和平的手段轉移守舊勢力」。⁸⁵ 言下之意，新舊交替不過是時代演進的必經階段，實在不需要激烈的爭鬥。

⁸² 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63-64。

⁸³ 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64。

⁸⁴ 香港文學史研究者陳智德的研究，綜合了二、三十年代香港文人對於文壇的觀感，看到普遍都有種「新舊混雜並且對立的狀態」的觀感。總括而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舊文學兩派並行，新文學的支持積極地推動屬於香港的新文化運動，而在內地式微的舊文化，仍在香港延續。見陳智德，〈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63-166。

⁸⁵ 以上引文，分見胡適，〈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8-9。

(三) 學生撰文抒發觀感

胡適的到訪，得到社會各界關注，報章中對胡適香港之行有詳細的報導。此外，也有一些年青學子撰文投稿抒發他們對胡適訪港的看法。例如一名在讀學生鄭德能（?-?），在胡適訪港期間有機會聆聽演講，後來更寫下一篇〈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投稿報刊，記述了胡適來港引起的迴響以及香港文壇的弊病。據他的觀察，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膽敢批評「太史」；若果批評太史，便會惹起學生的不滿。即使是「天天在喧嚷著新文學的人」，在自己辦的學校還是屈服於保守社會氛圍，而「請了幾位八股氣很重的老先生去教國文。」⁸⁶ 對於胡適勇於批評太史，鄭德能深表讚許：

胡適之先生真是老不客氣啦！六日下午在華僑教育會裏演說，居然說起翰林在江浙方面多得很，並不值得令人怎樣的驚羨，因為他們是不適用的東西了，猶如豆油燈是不應該貴重一樣。我想此後各校當國文教員的人，或者可向學生哥批評太史派領導下的文學的沒有價值，令一般學生勿再絞盡腦汁去應付某某等太史評定下的時鐘，及作些充滿着八股氣派的文章吧？教師們也許不須再拾太史的唾餘，以為餵學生的資糧了。⁸⁷

胡適當天的演講的確是指出應以新學應對時需，但語調溫和。胡適不過是借助油燈與電燈、人力車與汽車作比喻，說明新學與舊學的价值，鼓勵聽眾、時人要多思考它們是否切合當前身處的時代需要。在這篇演講中，胡適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香港崇尚傳統風氣形成的原因之一：

⁸⁶ 鄭德能，〈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收入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8-1941）》（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頁21-22。

⁸⁷ 鄭德能，〈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收入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頁21-22。

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它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遺物……在邊境或殖民地的人，對於娘處來的東西，都想設法去保持它，說是祖宗的遺物。⁸⁸

香港在地理上位處中國邊陲，同時更是國內新文化難以化及之地。香港的商人多為粵籍，為營商而定居香港。英國管治香港奉行不干涉華人固有生活習慣為原則，但年青一代則多有崇尚西方的傾向，致使居港華人紳商十分擔心年青一代「數典忘祖」，⁸⁹ 在日見西化的香港失去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傅秉常（1896-1965），在回憶錄便曾提到在港就學期間，其父特聘賴際熙為其私人傳授經史之學。⁹⁰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於1929年正式掛牌成立時，出資最多的馮平山（1860-1931），也特意安排兩名兒子入讀該院，接受傳統的系統經學教育。

直至1935年，亦即標誌新文化運動發軔的《青年雜誌》（第二期改名《新青年》）成立二十周年，中國文白之爭早已明日黃花之際，香港一隅仍圍繞「語體文」是否「教育上急宜糾正的問題」展開討論。⁹¹ 不過，這屬於公眾層面的文白之爭在另一方面也顯示，年青學子對經學已經大感不滿。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甚至出現老師比學生多的情況，至1936年，港大中文學院更只剩下一名學生。⁹² 香港教育

⁸⁸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8。

⁸⁹ 1925年12月10日的華僑日報記錄，香港知名華商開會討論，請求新上任的總督金文泰開辦官費營運的中文中學。他們的理據「將中國文化大為發展，免久居於香港之僑民，連中國文字都不懂，致有數典忘祖之誚。」〈紳商會議請政府在本港創設港文中學〉，《華僑日報》第2張第2頁，1925年12月10日。

⁹⁰ 黃振威，《傅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30。

⁹¹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5日。

⁹² 〈胡適博士到港備受各方歡迎〉，《華僑日報》第2張第1頁，1935年1月5日。

界不少人已意識到當時教育最大的問題，是教育話語權「由遺老及遺少」把持。⁹³ 當中國政局轉變化而中港經濟、文化往來頻密，執掌香港經濟命脈，在社會上有重大話語權的華商，也必須接納經史以外的新思想。就以周壽臣為例，他在港大會議上也表態認同中文學院有其改革的需要。⁹⁴

胡適的一場演講，在保守氣氛濃厚的香港能否帶來改變，也有學生聽眾感到懷疑。一位署名江南雪諦（?-?）的學生，向中國的《人民評論》投稿，以其接受香港教育的第一身經驗，認為「所謂近年香港教育當局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不過是煙霧彈，香港人亦並未醒來。⁹⁵ 在他的眼中，胡適的南來未必能夠改變香港的情況。

從胡適訪港的迴響既有認同，也有反對；有人相信會帶來改變，也有人坦言胡適之言無補於事。從親身體驗者的反響中，我們看到的是，支持新學的聲音漸漸加強，但長期佔據文教話語權的保守勢力也一直守護著他們所珍視的傳統經學。⁹⁶ 縱然政府有意改革，但改革之路也很難因為胡適的一次訪港而能夠立刻改弦易轍。香港，畢竟有其自身的社會獨特性與複雜性。

⁹³ 官立漢文中學的李景康是香港大學文學院首屆畢業生，是賴際熙的得意弟子。其任校長的「官立漢文中學」的中文教育以經史為綱。1933年該校的校刊中載有學生作品「論衡」26篇文章，「經義」31篇，同樣全以文言文撰寫。參官立漢文中學，《官立漢文中學校刊》（香港：官立漢文中學，1933年）。

⁹⁴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urt of the University to report to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November 23, 1931,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 Closed File/ Chinese Studies Box 2.

⁹⁵ 江南雪諦，〈香港的教育：獻給胡適之先生〉，《人民評論旬刊》第75號，1935年4月12日，頁34-35。

⁹⁶ 港督貝璐在上任後談及香港的教育制度時，也慨嘆面對著香港內部華人及英人的頑強保守勢力，要改進港大的中文教育是個「極不尋常的難題」。William Peel, “Letter from William Peel to Walter D. Ellis,” June 10,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p.20.

不過，無論如何，胡適於 1935 年的適時到來，無疑為新文化支持者注入了一支強心針，他為港大帶來了許地山，也間接讓擁護傳統的前清翰林看到新文化可取的一面。故此，在新舊文化權勢輪替甚至角力之際，胡適的訪港，於客觀上讓天秤稍微傾向改革者的一方。這點無疑要有全面的認識，也需要我們作出客觀的評價。

六、訪港餘波：胡適的廣州之行與魯迅的南來際遇

胡適訪港深受香港在地社群的熱烈歡迎，但他在訪港後順道到訪廣州時，卻飽受廣州學界與輿論批評，連原訂於中山大學的訪問也被逼取消。胡適的《日記》及〈南遊雜憶〉一文均清楚記下了當時廣州報刊的評論以及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古直（1885-1959）及鍾應梅（1906-1985）的口誅筆伐言論。在日記中，他借鄭鐵如十歲小兒之口，嘲諷了「古直先生妙文」——其言曰：「中山大學的國文系主任不應該做出這樣不通的文章」，⁹⁷ 胡適對古、鍾之文頗不以為然。在〈南遊雜憶〉中，他釐清了引發是非爭端，主要都是源於記者的斷章取義及錯誤引述，因此惹起廣州相關人士的醋意以及誤解，使他在廣州本來是萬眾期待的公開演講也被逼取消，並且飽受輿論批評。⁹⁸ 例如在《社會日報》一篇題為〈胡適的沒趣〉便批評胡適贊揚香港、貶低廣東，斥之為「大拍洋大人的馬屁」、「不惜醜詆國人，以博洋大人們的歡心」；⁹⁹ 另一篇在《大學新聞週報》題為〈胡適在香港〉的文章，同樣批評胡適「冒國人之大不韙」對香港教育當局大捧特捧，是「為侵

⁹⁷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 7，頁 186。

⁹⁸ 胡適在〈南遊雜憶〉一文中，指他在演講中的措詞是「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善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被誤寫為「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兩句話的意思是截然不同，卻因記者誤錄而遭斷章取義。見胡適，〈南遊雜憶（一）香港〉，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 5，頁 64。

⁹⁹ 大風，〈胡適的沒趣〉，《社會日報》第 2 版，1935 年 1 月 19 日。

略主義張目」。¹⁰⁰ 中山大學方面則由校長鄒魯（1885-1954）親自廣發布告，批判胡適，取消原訂的胡適演講活動：

為佈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時請胡適演講。業經佈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佈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佈。¹⁰¹

上述頗似於檄文的發布，為本來要忙碌出席演講活動的胡適突然間獲得兩天半在廣州閒逛的假期，自言是「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石碑的中山大學新校舍，禪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層樓的鎮海樓，中山紀念塔，中山紀念大禮堂，都遊遍了。」¹⁰²

據論者研究，胡適在中山大學的演講被取消，表面原因是稱讚香港熱心新文化，反過來批評廣東保守，但實際上是因為胡適公然反對執掌廣東軍政大權的陳濟棠（1890-1954）所推動的讀經風氣。這反映了胡適的思想主張及學說言論對於陳濟棠的不敬，同時也威脅了陳濟棠在廣東推行的讀經運動。¹⁰³ 胡適的演說，有意無意地將英國有意改革以經史為主的中文教育視為一種進步，這一經記者的斷章取義便

¹⁰⁰ 木公，〈胡適在香港〉，《大學新聞週報》第2卷第19期，1935年1月21日，頁1。

¹⁰¹ 胡適將相關的布告轉錄在〈南遊雜憶（二）廣州〉一文中。參胡適，〈南遊雜憶（二）廣州〉，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71-72。

¹⁰² 胡適，〈南遊雜憶（二）廣州〉，收入胡適著，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頁73。

¹⁰³ 耿雲志，〈胡適在香港講演引起的風波〉，頁79。

直接變成了把廣東當局推崇讀經運動的復古氛圍作出「前進」與「倒退」的對照。然後再因為報刊的片言隻語的誤解陳述，一變而成為了胡適對三千萬廣東人的侮辱，進而更有古直、鍾應梅等中山大學教授刊報及拍發電報給廣東、廣西的國民黨、政、軍、警、司法部門首腦的激烈行動，公開呼籲要將胡適扣留與就地伏法。

胡適的香港演講——尤其是在華僑教育會上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攻擊或辨誣的文章還從廣州回流至香港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再次應驗時人普遍對胡適的評價：「名滿天下，謗亦隨之」。¹⁰⁴ 透過胡適訪港、訪粵際遇上的巨大落差，既說明國民黨廣東當局在文教方針上的政令不一，又說明廣州學界在陳濟棠當政下的復古保守的一面，正好對照了 1930 年代中期，香港當局乃至社會民間對於新文化、新文學發展而出現的熱衷態度。此情此境，與 1927 年魯迅訪港時的遭遇與觀感，倒有相互易位之別。

基本上，胡適訪港五天，受到港府極為隆重的高規格官式招待，此情此景與早其八年訪港的魯迅那種被冷遇、被搜身、講座被監視，彼此可謂是雲泥殊路。魯迅訪港之際，香港與廣東的關係正處於二戰前最嚴峻的階段。1925 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香港與廣東交惡，歷時 16 個月方才平息工潮。香港社會經濟幾近破產，直至 1927 年初仍未全面恢復官方交往。但緊接而至的，還有更為嚴峻的中英關係——英國在九江、漢口租界於 1927 年年初被中國收回，英國派出軍艦遠征上海恫嚇。香港政府收到廣東方面想發動第二次大罷工的消息，金文泰、周壽臣、羅旭龢等政要也收到廣東方面將會派人暗殺他們的情報。¹⁰⁵ 如此種種，都讓港府成為驚弓之鳥。故魯迅訪港前後，社會

¹⁰⁴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這話已廣為後世研究者據以概括胡適的一生。此話原見於程滄波，〈胡適之最近幾篇文章〉，收入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28-193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卷5，頁741。

¹⁰⁵ Cecil Clementi, "Letter from Cecil Clementi to L. S. Amery," March 18, 1927, University of

氛圍特別緊張。

魯迅訪港期間，於 1927 年 2 月 18 日、19 日分別在上環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發表「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演講。就在魯迅發表第二場演講的翌日（即 2 月 20 日），毗連的深圳便發生了農兵持械穿越邊界的事件，雖然沒有爆發雙邊軍事衝突，但這事已令港督金文泰緊張不已。¹⁰⁶ 魯迅此時訪港，可謂是十分不合時宜。他演講時的言辭十分銳利，嚴厲地批判經史舊學。但是，香港當局此時正有意利用儒學抵禦激進思想進入香港，致使經史舊學在港大入學試及中文學院獲得制度化確立。魯迅的演講，正是切中港府要害。雖然有關演講於國內而言只是老生常談，但在香港當局角度來看，則是不可接受的。在大罷工工潮後，但凡挑戰港府權威或者港府所推動的文教政策，都會被視為一種激進新思潮的威脅。魯迅所遭遇的「審查」、「講稿禁止刊登」、「搜身」，都是在特定政治氛圍下的管控手段，致使魯迅因諸多「逼害」之感而產生南來香港總是「畏途」之嘆。¹⁰⁷

基於香港的各種社會管控，造成魯迅從登船來港到離港北返，都對香港留下十分差劣的印象。然而，與魯迅同為新文化運動領袖與五四旗手的胡適，時隔八年後訪港卻受盡各方禮待，這種截然不同的際遇，反映的不只是他們因為人格個性、政治主張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對待，還可以讓我們看到就在這短短的八年裏香港社會思想面貌是如何地速變與多變。與魯迅完全相反的是，胡適以貴賓身分獲邀來港領取名譽博士學位。在頒獎典禮上，另一名與胡適同場獲頒名譽學位的，正是港督貝璐本人。正如上言，港大頒授名譽學位的名單，必然需先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19/ File 3, p.75.

¹⁰⁶ Cecil Clementi, "Letter from Cecil Clementi to L. S. Amery," March 18, 1927,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19/ File 3, p.75.

¹⁰⁷ 魯迅在港所遇的經歷主要見於〈略談香港〉、〈談「激烈」〉及〈再談香港〉三文。魯迅，〈略談香港〉，《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卷3，頁446-447；〈談「激烈」〉，卷3，頁497-498；〈再談香港〉，卷3，頁559-561。

經過港督的認可；胡適與港督同場接受最高學府的最高殊榮，這可說是香港方面對胡適的最大敬意。

要言之，魯迅經歷的香港，是發生大動盪政局後官方將經史舊學納進制度以成管治手段的新時期；胡適訪問的香港，則是港府欲將制度內的經史舊學革新，推動國語教育及白話文發展——藉以配合現代中國社會發展所需的新時代。時代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在香港的不同際遇，也催生他們對香港截然不同的感受。

七、餘論

總言之，胡適對於自己南來香港的整體結果，個人感到是十分滿意的。他所到之處，達官貴人與舊雨新知均前呼後擁，他的中國文藝復興及新文學運動的學說理念也有機會在境外闡釋，並且得到香港在地社會管治階層及精英知識群體的基本肯定，他本人對於香港的國語教育、白話文發展乃至中文教育，均寄予殷切期盼。可以說，胡適南下訪港，刮起了一場新文化旋風，也為香港華洋社會了解現代中國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機會。他的訪港之旅，引起了在地的不少迴響，彰顯了其人其學的時代意義與影響力。

就在胡適 1935 年 1 月訪港後不久，影響香港教育深遠的英國皇家督學賓尼（Edmund Burney, ?-?）主導的《賓尼報告書》於是年 5 月正式出台。¹⁰⁸ 在此之前，香港的中小學大多數都只是私塾學校或不正規的中小學。《賓尼報告書》的教育改革，代表了更為重視英國在華、在遠東整體利益的倫敦的意願，敦促香港政府要大量擴建官立的中小學，並且要推行國語與白話文教育，藉此提高華人教育的機會

¹⁰⁸ E. Burney, *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pp. 24-25.

以及推行接近中國教育模式的中文教育。當然，這樣做的最終目的，也是離不開英國維護其於新上台的國民黨政權管治下的中國的切身政治利益。

然而，不能忽視的一點是，港府被建議要擴充中小學而實施教育普及化，特別是要考慮推動學習白話文及開展國語教育，其目的是要減少在地適齡學生離港回國求學導致的社會不穩。藉著這種教育制度及語文政策的改革建議，希望減輕國內民族主義或國民教育對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社會的思想、文化衝擊。這一切，與胡適訪港之間是否存在著怎麼樣的微妙關係，也值得我們將來繼續探究。不過，我們就此也可以了解到，看待英國殖民地時代的百年香港社會流變，除了中國時局變化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因素外，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乃至香港社會內部的自我求變，均是林林總總的複雜因素，這些也是不能作簡單化處理的課題。不過，這些論述目前已超出了本文的關注範圍了。

（責任校對：黃博英）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方駿、熊賢君，《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公司，2008年。
-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卷2，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著，王德威主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 王宏志，〈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21-39。
- 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 江勇振，《日正當中 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
- 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3卷第5期（2009年9月），頁26-30。
- 官立漢文中學，《官立漢文中學校刊》，香港：官立漢文中學，1933年。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921-1922）》，卷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_____，《胡適日記全集（1928-1930）》，卷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_____，《胡適日記全集（1934-1939）》，卷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胡適著，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卷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 _____，《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卷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 耿雲志，〈胡適在香港講演引起的風波〉，《百年潮》1997年第5期，1997年5月，頁78-80。
- 梁操雅、丁新豹等著，《教育與承傳：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年。
-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1，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
- _____，〈總序〉，收入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1-39。
- 陳智德，〈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58-170。
- 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1998年12月，頁60-73。
- 黃振威，《傳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_____，《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
- 趙靖怡、席雲舒，〈胡適、陳受頤往來書信考釋〉，《魯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4期，2021年4月，頁66-85。
-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
- 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
- _____，《胡適的北京情緣：一個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21年。
- 魯迅，《魯迅全集》，卷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樊善標，〈從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1941）編輯策略的本地面向
檢討南來文人在香港的「實績」說〉，《台灣文學研究》第6期，
2014年6月，頁281-316。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文學》第80期，
1991年8月，頁60-64。

Burney, E. *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36-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36.

二、報刊文獻

〈紳商會議請政府在本港創設港文中學〉，《華僑日報》第2張第2
頁，1925年12月10日。

〈香港漢文中學定夏曆來春開辦〉，《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6
年1月21日。

〈我國著名學者胡適之博士昨抵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1版，
1935年1月5日。

〈胡適博士到港備受各方歡迎〉，《華僑日報》第2張第1頁，1935年
1月5日。

〈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禮，貝督與胡適博士均獲榮譽學位〉，《工商
日報》第3張第1版，1935年1月8日。

〈胡適在港演講發生反響：香港輿論界均無好評論、中大嶺大講期臨
時中止〉，《民報》第1張第3版，1935年1月10日。

〈港大中文系僅有學生一名〉，《工商日報》第3張第1頁，1936年1
月18日。

大風，〈胡適的沒趣〉，《社會日報》第2版，1935年1月19日。

木公，〈胡適在香港〉，《大學新聞週報》第2卷第19期，1935年1月

21日，頁1。

江南雪諦，〈香港的教育：獻給胡適之先生〉，《人民評論旬刊》第75號，1935年4月12日，頁34-35。

胡恒錦，〈白話文與經學二〉，《華字日報》第2張第4頁，1935年3月22日。

_____，〈白話文與經學三〉，《華字日報》第2張第4頁，1935年3月23日。

“Progressive China, Enormous Stud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r. Hu Shih’s Rotary Tal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 9 January 1935, p.10.

三、檔案

Ashton-Gwatkin, Frank. “Frank Ashton-Gwatkin to Viscount Willingdon.” January 11, 1926,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11637/F1174.

Clementi, Cecil. “Letter from Cecil Clementi to L. S. Amery.” March 18, 1927,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el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19/ File 3.

Chai-Hei, Lai. “Letter from Mr. Lai Chai Hei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ment.” January, 1930,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32/File 1.

Drake, F. S.. “Letter from F. S. Drake to W. W. Hornell.” April 22, 1933,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Drake, Rev. F. S.

Hornell, W. W. “Note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February 8, 1928, The National Archives,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24/2.

_____. “Letter from W. W. Hornell to C. Clementi.” October 19, 1928,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20/File 3.

_____. “Minute by the Vice Chancell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ctober 9,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_____. “Letter from W. W. Hornell to Arthur Mayhew.” February 21,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_____. “A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 Reader in Chinese.” December 18, 1932,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Drake, Rev. F. S..

_____. “Appointment of a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May 11,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ü Ti-shan Collection.

Kotewall, R. H. “Hong Kong, Strike and Boycott.” October 24, 1925,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489.

Lugard, Fredrick. “Notes of Conversation with Clementi.” February 20, 1931,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Papers of Fredrick Lugard, MSS Lugard L95/5.

Lampson Milles. “Letter from Milles Lampson to William Peel.” March 11,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urt of the University to report to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November 23, 1931,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 Closed File/ Chinese Studies Box 2.

Peel, William. “Despatch from William Peel to Lord Passfield.” October 16, 1930, The National Archive, Colonies, Gener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323/1080/5.

_____. “Letter from William Peel to Walter D. Ellis.” June 10,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_____. “Letter from William Peel to W. W. Hornell.” April 8, 1931, The National Archive,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129/531/9.

Shou-Yi, Chen, Chao-Tsu, Yung. “Report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bmitted to the Vice-Chancellor by Chen Shou Yi and Yung Chao Tsu.” February 26,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oranda Vol.1 1928-1935, No.81.

Shih, Hu. “Letter from Hu Shih to W. W. Hornell.” May 10, 1935,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ü Ti-shan Collection.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Report by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to the Advisory Committee appointed under the China Indemnity (Application) Act, 1925.” June 18, 1926,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 2(1926).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at Government House at 11 a.m. on Friday.” February 17, 1928,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War Files: General Records Closed Files/Chinese Studies Box 2.

Waterlow, S. P. “Telegram from S. P. Waterlow to Lord Eagle Buxton.” April 26, 1925,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 FO 371/10927/F1303.

Wellesley, Victor. “Victor Wellesley to Ronald Macleay.” August 19, 1926,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FO 371/11640/F3173.

四、網路資料

香港大學頒授典禮網站，<https://www4.hku.hk/hongrads/tc>，瀏覽日期：2023年7月25日。

An Astounding Association: Hu Shih and Hong Kong

Hok-Yin Chan*, Ka-Ho 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e following five significant points: (1) it clarifies how the remission of the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propelled Hu Shih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 (2) it examines how Hu Shi facilitated the reform of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recruitment of the department's head; (3) it illuminates Hu Shih's personal network in Hong Kong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his acceptance of the invitations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be awarded his first honorary doctorate; (4) it describes how Hu Shih's Hong Kong trip initiated various responses in both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nthusiastic response to Hu Shi's visit to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belated debate over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followed his visit; and (5) it summarizes Hu Shih's speech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Hong Kong, and explores the views of both Chinese leaders and Hong Kong front-line education officials concerning Hu Shih's "Chinese Renaissance." Finally,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Chinese regime influenced Hong Kong's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Hong Kong's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oderated British conduct i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Guest Lecture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Key words: Hu Shih, Hong Kong, Chinese reform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cal interaction, *baihua* (Vernacular Chinese), Classical education

